

刀与伤口同源：对追问者概念处境的一项阐明

工具的运作需要切开，而真正的源头不容切开——追问者在自造的不可能对象上烧掉了自己

胡志英 著 · SDE 学员 · 认识论与追问者位置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两千年来，关于宇宙最深结构的追问始终被锁在“物质在先还是关系在先”的二元框架内。本文要做的不是判断两种答案孰对孰错，而是揭示追问者的概念工具本身在触及发生源头时，会遭遇一种可被精确描述的、此前未被独立命名的结构性处境。通过让三组独立的“发生”洞察在一个共享的深层矛盾上互撞，本文逼出一个新命名——概念的自噬结构：追问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它们是发生过程的后期结晶，依赖边界、区分、命名来运作）在他用来追溯那个先于一切分化的发生源头时，不是遭遇了外部的悖论，而是亲手在那个源头上制造了它无法消化的切口。工具的运作需要切开，而真正的发生源头不容切开。工具在自造的不可能对象上烧掉了自己——而追问者对这个自毁动作浑然不觉，因为他已将自己正在执刀的手豁免于追问之外。

关键词：概念的自噬结构，发生，工具处境，追问者位置，自我豁免，证伪条款

这一自噬结构不是偶然的认知失误，而是追问者作为被包孕于发生之内的存在者、在特定追问层次上必然遭遇的结构性处境。它在逻辑起点上制造工具自噬（概念与对象的强制错位），在意义根基上触发手的自悖（向之求稳定的动作暗中证伪了稳定之根基），在时间感上系统性地将活过程误认为死实体。本文以十九世纪末物理学对“以太”的集体扶稳与放弃为核心经验线索，贯穿三层机制的展开全程，将这一处境的运作模式完整呈现。在此基础上，通过逐个与海德格尔、哥德尔、康德、维特根斯坦这四个在同一片山脊上攀爬过的最近邻进行深度碰撞与切割，确立该阐明的独立边界——尤其在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与“河床”论述的正面对决中，逼出“手的自悖”不可还原的理论收益。本文将这一阐明代推衍至物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与人工智能四个领域检验其解释力，与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与预测处理理论进行深度对话以标定其理论坐标，并以皮亚杰理论作为反向检验标定其射程；最后在结论中正面追问“觉知”自身的自噬处境，给出明确的证伪条款，并规定这支箭必须首先射向持有它的那只手。

一、引言：追问什么，就已经错过了什么

物理学家盯着粒子，哲学家盯着关系。前者说，宇宙不过是一堆基本粒子的排列组合，关系不过是物质派生出的表层现象。后者说，恰恰相反，你所谓的“物质”，不过是关系网络的结点，是相互作用在时空中的局部凝结。这场拉锯战已经打了上百年，至今没有停火的迹象。双方都握有强大的证据：物质论者可以指着桌子说，你看，它实实在在，不管你注不注意它，它就在那里——砸碎它有木屑，拆开木屑有分子，再往下有原子、质子、夸克，每一步都有“东西”；关系论者则回应说，你永远看不到一颗孤立的夸克，它被强相互作用锁死在质子内部，它的全部可定义特征——质量、电荷、自旋——都不是它的内部属性，而是它在与希格斯场、电磁场、其他费米子的交互中被锚定出来的。在量子场论里，“粒子”本身已经融化了：电子不再是微小的台球，而是电子场的局域激发态。场比粒子更根本。

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战场。因为双方共享着一个从未被追问的前提：宇宙总得有一个“最深的结构”，总得有一个最后的、不可再分的“什么”——要么是物质，要么是关系。这个前提，才是真正该被撬开的东西。

本文要揭示的是：任何关于宇宙“最深结构”的追问，一旦试图将追问者自身排除在发生过程之外，就会陷入一种可被精确描述的结构性处境。这种处境的根源不在于追问者的智力不够，而在于他用来追问的概念工具本身——它们不是中立的、可以从外部伸入发生的探针，而是发生过程跑到一定圈数后在人类认知中沉淀下来的后期结晶。这些工具的运作需要边界、区分、命名——它们必须能把一个可被指认的“起点”从混沌中切出来，才能启动追问。而那个先于一切分化的发生状态，恰恰不能被这些工具切而不死。追问者不是在追问中“遇到了”悖论，他是用他的工具亲手把那个悖论制造了出来——而他对这个制造动作浑然不觉，因为他已经把那个握工具的手（他的追问行为本身）豁免在了追问之外。

这个处境本身需要一个名字。本文将它命名为概念的自噬结构：一把从发生之河里捞出来的刀，在被用来追溯河的源头时，不是切到了石头，而是切到了一个刀自己制造出来的、不容切开的切口——刀在那道看不见的伤口上自毁了，而持刀人以为自己是撞上了宇宙的硬底。

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永久治愈的认知病理，而是追问者作为被包孕于发生之内的存在者、在特定追问层次上必然遭遇的结构性处境。他可以在每一次追问中更多地觉知到刀是自己造的、伤口也是自己切的，但他无法永久地跨越这个处境。觉知不是治愈——它只是让追问者在这个处境绊住他时，能更快地认出：不是自己不够聪明，是自己正在用一把从河里捞出的尺子，去量河的源头在哪里。知道尺子也是河水做的，这并不能让尺子变得精准，但能让人不再把尺子的刻度当成河的边界。

在正式展开之前，有必要先引入一个将贯穿全文的经验线索。十九世纪下半叶，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了电磁现象，但随即抛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光作为一种电磁波，在真空中穿行数百万光年，它靠什么介质振动？声波需要空气，水波需要水——那么光波的介质是什么？物理学共同体给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完全合理的答案：以太。以太被设想为一种充满全宇宙的、极其稀薄却极其坚硬的介质——稀薄到行星穿行其中不受阻力，坚硬到能以极高频率传递光的横波。一代物理学家的学术生涯、实验设计、理论推导，都押在了这个前提下。然而，这个被如此精密地集体扶稳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个自悖的胎记：它必须同时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和最软的东西——这两种属性在已知的任何材料中都不曾共存。直到1887年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给出零结果，整个以太大厦在数年内崩塌。

为什么最训练有素的一群头脑，会集体扶稳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长达数十年？这个历史之谜，正是“概念的自噬结构”的完美标本。它将在接下来的每一层机制展开中被反复回到，作为理论的血肉而非装饰。

以下，我将首先用三幅“透视图”从正面显示概念的自噬结构在三个不同领域的运作形态（第二节）；然后正面展开这一阐明的完整三层机制，在展开过程中以以太案例为主干、辅以实例，让机制从历史中长出来（第三节）；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三组关于“发生”的独立洞察进行互撞与提取不变量，逼出这一阐明的独立边界，并在逐一与海德格尔、哥德尔、康德的深度碰撞中完成切割——同时在这些切割之后插入一段自我切割，以贯彻本文的反身性要求（第四节）；随后单独设置一节，正面处理本文最强劲的敌意近邻——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与“河床”的论述——并在此节中完成“不可还原硬校验”与深度交锋，真正确立“手的自悖”这一层的独立理论收益（第五节）；接着将这一阐明的解释力推衍至物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与人工智能四个领域，补入认知科学对话以标定理论坐标，并以皮亚杰理论作为反向检验标定其射程（第六节）；最后在结论中正面追问“觉知”本身的自噬处境，给出明确的证伪条款（第七节）。

二、三幅透视图：概念的自噬结构在不同领域的呈现

在正面展开这一机制的完整内核之前，有必要先让它在三个具体的追问现场呈现。这三个场景各取自一个学科，但它们的深层结构惊人地一致。把它们并置，不是为了凑例子的数量，而是为了让那个跨域共享的深层形态自己从差异中浮出来[1]。

2.1 第一幅：物理学追问中的“观察者伤口”

量子力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观察者的地位问题所困扰。哥本哈根诠释把它推到了极致：被测量之前，系统的状态只是一团概率幅的叠加；测量动作本身，是让这团概率幅“坍缩”为确定值的那个不可逆的事件。但“测量”又是由一个物理仪器和一个最终记录结果的观察者共同完成的——观察者凭什么居于物理定律之外？这个尴尬在量子力学内部被视为“诠释问题”——不是理论有漏洞，而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共识的哲学立场去消化它。[7]

让我们把镜头推得更近。一个物理学家要测量一颗电子的自旋。他设定仪器沿Z轴方向测量，得到“上旋”的结果。在他设定仪器的那个瞬间，他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他替电子选了一个被问的方式——“你的自旋在Z轴上是上还是下？”；第二，他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问法——他没有问“你的自旋在X轴上是左还是右？”而量子力学的核心洞见恰恰是：在被以特定方式询问之前，电子不以那个被问的特征的方式存在。不是“仪器干扰了电子”那种可以被修正的工程误差，而是“提问动作本身与答案的生成是不可切割的同一件事”。

现在，这个物理学家坐下来写论文。他写：“实验测得电子在Z轴方向的自旋为上旋。”这句话在主谓宾的语法结构里，制造了一个干净的分离：主语是实验，谓语是测得，宾语是电子的自旋为上旋。但这个句子是一个语法谎话。它把“提问动作与答案生成是同一件事”这个不可切割的整体，硬切成了“问归问、答归答”的两片。它把物理学家自己的手——那只设定了Z轴方向、排除了其他问法的手——从句子中洗掉了。然后他读自己写的句子，并被自己的语法说服：看，电子本身就有一个待我去测的属性，我只是把它测出来了。这就是概念的自噬结构在物理学追问中的第一层呈现：概念的语法制造了主客分离，然后把这个语法产物误认为对现实的忠实描述。追问者不是“遇到”了观察者问题——他是用他写论文的那个句法，亲手把观察者问题造了出来，然后把它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外部困难”。

而更深的一层是：物理学共同体对“闭嘴计算”的集体默许。他们知道量子力学的基础诠释有深洞，但他们选择不追问。这不是懒惰，这是在维持学科健康的必须——如果每一篇物理论文都要先从诠释问题写起，物理学作为一门累积性学科就塌了。但这种健康的自保，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自噬失明：共同体用共享的默许，把那个最深的刺包裹在一层不予追问的共识织物里，然后自己就稳稳地站在这层织物上，继续往上盖更高层的大厦。他们手里的刀（标准模型、量子场论、重整化群）锋利无比，切割微观世界如庖丁解牛——但这把刀在基础诠释的层面，已经切到了它自己制造的伤口上，而那伤口被集体的沉默包住了，看不见血。

2.2 第二幅：心理学追问中的“扶稳者失明”

转换场景。一个来访者坐在治疗室的沙发上，对治疗师说：“我总是被同一类人吸引，然后被同一类方式伤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被锁死在一种模式里了，我想打破它，但我做不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学追问：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能不能找到那个不再让我痛苦的“我自己”？

治疗师开始工作。她追溯来访者的童年依恋关系：一个情感上无法获得的母亲，一个用批评来表达关心的父亲。她在来访者的叙事中识别出重复的模式：每一次他感到亲密关系即将稳定时，他会无意识地制造一场冲突，把对方推开——然后告诉自己：“你看，果然没有人真的会留下来。”她把这些模式命名为“焦虑型依恋”与“自我实现的预言”。她做得非常专业，分类精准，每一步都有依恋理论与认知行为治疗的文献支撑。

但有一个东西，在她和来访者共同建构的这个精准分析里，被系统性地漏掉了。那个东西是：来访者此刻正在治疗室里做的那个动作——他向治疗师倾诉、他接受她的命名、他在她的注视下表现出脆弱的那个时刻——这个动作本身，是不是正在发生一个新的、不同于他童年模式的互动？他正在用一段他此前从未有过的关系经验（一个稳定的、不评判的、不以推开他的方式来回他的退缩的治疗关系），在执行一个他此前从未执行过的扶稳动作：他允许另一个人理解他，并且在被理解时不逃跑。“允许被理解”不是一个可以被贴上“焦虑型依恋”标签的旧模式——它是一个正在治疗室里的这一秒发生的、全新的发生。但因为它不符合“追溯旧模式”这个追问框架的语法，它没有被命名为“新东西”。它被当成了那个旧模式的又一个“临床表现”。

概念的刀在这里又切了一刀：来访者的活发生，被切成了“旧模式的重复”和“症状的再现”两片，那片真正新的、脆弱的、还没长稳的芽，被当作不值得独立命名的背景噪音，扫进了诊疗记录的字里行间。追问者和被追问者共同执行了这个切除——他们联手把正在发生的活东西做成了死标本，然后问“这个标本为什么不会动？”不是因为它不会动，是因为它在被你做成标本之前，还在动。而你的手，在那一刻，是握刀的。

2.3 第三幅：社会学追问中的“不在场的手”

再看一幅更大尺度的透视图。社会学里有一个常见的分析词汇：“制度空心化”。研究者们观察到，当代婚姻、教育、民主参与等核心制度，正在经历一个“壳还在、魂没了”的过程。人们还在结婚，但婚姻的六大原生功能——经济合作、情感亲密、社会规范、育儿支持、日常协作、法律契约——中有五个已被外部服务系统性替代。婚姻从全功能制度退化为纯法律合约。通常的解释路径，是指认外部替代力量——市场经济、数字技术、官僚制——如何逐步掏空了制度的原有功能。这种结构论的解释在社会学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它将制度视为一个受外部力量作用的被动受体，而行动者的日常实践则被归入“被结构所塑造”的范畴，其在每一刻对制度的再生产贡献，在分析框架中没有独立的因果位置。

这个解释有其说服力，但它的语法结构在根子上已经做了一次切割。它把“制度”切成了“容器”（一个被动受体），把“外部力量”切成了“掏空者”（一个主动施体）。这个切割让一个关键的东西从视野里消失：那些日常的、个体的、不经意的互动选择。让我给出一个具体的场景：一对已婚七年的夫妻。妻子下班回家，丈夫在沙发上刷手机。她放下包，开始准备晚饭。他们之间没有争吵，没有冷战，甚至没有明显的不快。她切菜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瞬间她想“今天单位里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但她没有说。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她已经太累，而她知道他会以“嗯”来回应，不多问一句。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瞬间，那个被咽回去的分享冲动，就是婚姻在那个晚上被掏空了一小块——没有宏观的历史力量在背后指挥，只有她那个晚上、在切菜的厨房里、被日常疲惫和习得性预期共同执行的一次沉默。

而这个沉默，在社会学的标准解释里，不被视为“掏空动作的执行者”——它被归因为“外部力量削弱了互动意愿”。外部力量成了主语，她成了宾语。她的手从分析中被洗掉了。她的那把刀——那个她用来切菜、也用来切掉自己的分享冲动的日常选择——没有被看见。制度不是“被”掏空的，它是被无数个像她这样的个体，在他们最日常的、最不经意的互动选择中，亲手执行了不再扶稳那个需要互动密度来维持的联结。而社会学追问者对这只手的失明，让“制度空心化”这个分析本身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自我豁免：分析者站在空心化的外部，指出外部力量如何掏空了制度，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也在婚姻、教育、学术制度中每日执行扶稳或掏空动作的人——的那只手，逍遥于分析之外。

2.4 三幅透视图的共同结构

三幅图画共同结构的清晰到不需要更多铺陈了。在每一幅里，追问者都做了同一件事：他使用一把从发生过程中长出来的概念刀（物理学的“客观测量”、心理学的“依恋模式”、社会学的“外部力量”），去切一个正在发生、且追问者本人也参与其中的活过程。刀切下去，活着的東西被切成了“被问对象”与“提问动作”两片——然后追问者只研究那片“被问对象”，而那把正在切的手，那片“提问动作”，被语法地、认知地、制度地藏了起来。然后他端详着那片被切下来的死标本，问：“这东西为什么不动？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悖论？它为什么总是从我指缝里漏掉？”答案不在标本里。答案在那只他没有看见的、正在握刀的手上。

这就是概念的自噬结构。它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专属处境，它是追问者作为被包孕于发生之内的存在者，在使用从发生中长出的概念工具去切发生的特定层次时，必然触发的结构性处境。下一节，我将正面展开它的三层运作模式。

三、概念的自噬结构：三层运作模式

经过三幅透视图的呈现，现在可以正面展开这一处境的完整内核。它包含三个互相嵌套、互相激活的运作模式：在逻辑起点上的工具自噬，在意义根基上的手的自悖，以及在时间感上的时的遗忘。三者不是先后关系——它们在同一追问动作中被同时执行，分别从逻辑、存在与知觉三个侧面标记了追问者与他的工具之间的那道不可闭拢的缝隙。本节将以以太案例为主干，让理论在历史的血肉中自然长出来，而非先摆出骨架再贴案例。

3.1 第一层：工具自噬——逻辑起点上的概念与对象的强制错位

让我们从以太的故事开始。麦克斯韦方程组统一了电与磁，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精确计算出它的传播速度恰好等于光速。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但它同时挖下了一个深坑：波需要介质。声波靠空气的压缩与稀疏，水波靠水的起伏——任何已知的波，都是某种介质的某种振动模式。那么，在真空中穿行的光，它的介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的哲学好奇。它是经典力学世界观的逻辑硬需求：如果一个东西在振动，就必须有东西在振。如果没有东西在振，那“波”这个字就不能被用在它身上——它不是波，它是别的什么。而麦克斯韦的整个方程组，都是在“波”这个物理图景下被写出来的。方程组没错，但方程组的存在论前提——机械振动需要机械载体——与电磁波能在真空中传播的事实之间，横着一条无法被任何现有理论材料填平的壕沟。

于是，以太登场了。它被设想为一种无所不在的介质，透明、无质量、不阻碍天体运行，却又足够“硬”到能以极高频率传递光的横波。这个设想不是哪一个物理学家的奇想，而是整个共同体在追问“光的介质为何”时，用他们手头那把叫做“机械因果律”的概念刀，在不可切分的发生源头上切出的一个必要产物——一个“必须有东西在振”的逻辑硬需求，替他们指定了一个“必须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以太不是被发现的，它是被刀的切割需要所逼迫出来的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起点”。它的全部属性（极硬与极软的共存）之所以在已知材料中从不共存，正是因为它们不是任何真实材料的性质——它们是概念工具（机械波模型）强行要求对象满足的那组条件。刀需要它同时充当这两样东西，它就被赋予了这两样东西。

现在可以给出工具自噬这一运作模式的三条执行环节。

（1）工具的切割需要：概念工具必须把一个能被指认的“起点”从混沌中切出来，才能启动追问。在这个案例中，机械因果律这把刀的运作方式，是“一切波动必有振动介质”——没有这个前提，因果链在第一步就断了。刀必须切出一个介质，否则“电磁波如何能在真空中传播”这个问题就没有一个可以被物理学家之手抓握的切入点。

（2）对象的不容切割：那个先于一切分化的发生源头，恰恰不具备可供切割的边界。电磁波的传播，在生成机制的严格描述下，不是“介质的振动”，而是电磁场本身的局域激发态在时空中的传递——场不需要介质，场就是介质本身。但这个真相，只有在事后——在物理学家被迫放弃了用机械模型去追问“场本身是什么”之后——才能被接受。在以太争论的那个时代，电磁场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被力学模型解释的东西，它还没有获得“这就是原初事实”的哲学执照。追问者手头的刀（机械因果律）无法切出一个它不认识的、叫“场本身”的起点——因为场的概念在那时还没有从这把刀的阴影里独立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历史处境的回顾，我们可以看清楚：刀不仅在制造伤口，刀还在阻止那个伤口愈合——因为刀只能用自己能听懂的语言来描述伤口，而那个语言里没有“不需要介质”的语法。）

（3）自造伤口的盲视：追问者用工具在这个不容切割的对象上强行制造了一个伤口（一个有边界的“起点”），然后把这个伤口当作对象的真实面目来研究——而他对这个制造伤口的动作本身，失明了。物理学家不是在以太假说被提出后“发现”了它的内部矛盾——极硬与极软的共存，在以太假说被提出的第一天就已经是一个逻辑上可见的缝隙。但在那个缝隙被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撕开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家的眼睛能直接看见它。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握刀的那只手——那个“一切波动必有介质”的追问惯性——把他们集体锁定在一个认知位置上：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只能看见“以太的属性需要被更精确地测定”，而不能看见“以太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本身就制造了一个假的对象”。刀在切，眼睛在看刀切出的那个切面——而刀本身的运动，对眼睛是不可见的。刀不在视野里，因为它就是视野本身。

这个三层执行环节，在每一次追问者试图用概念工具去追索发生源头时都会被激活。它不是一种偶尔发生的错误，而是追问动作本身在特定层次上的结构必然。为把这一点再说透，再看一个小尺度的实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Newton, 1687）中从行星轨道一路追问到万有引力的来源——然后，他停了。他写下：太阳、行星、彗星的最初位置与运行轨迹，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在创世之初亲手设定的。这个“第一推动”，就是牛顿的刀口在他的因果链上切出的终极止步处——不是宇宙本身的硬底，而是十七世纪自然神学的认知图式在不被他察觉的情况下，替他的因果追问画下的终止线。“上帝”在那个论证里不是被发现的，是被他的刀——他用来追问“什么推动了行星”的那个机械因果的概念工具——在触及它自己无法再往前切的东西时，自行制造出的一个包着神学外衣的、工具的边界投影。

3.2 第二层：手的自悖——意义根基上的扶稳动作与稳定诉求的相互拆解

让我们继续跟随以太的故事。在“以太必须存在”这个前提确立之后，物理学共同体做了什么？他们不是被动地相信它，而是主动

地、制度性地、代际传承地扶稳它。实验物理学家设计干涉仪去测量“以太风”的相对速度，理论物理学家推导以太的力学属性，教科书将电磁波的传播机制以“以太的弹性振动”来描述。一代物理学家的学术生涯、声誉、研究经费，都押在了这个“以太存在着”的前提下。他们在做的，是在用自己的手——做实验的手、写方程的手、审稿的手、给研究生布置论文题目的手——日复一日地扶稳一个概念，让它在学科场域里看起来像一个越来越不可撼动的事实。

但关键在这里。物理学家们为什么要如此用力地扶稳以太？不仅是因为经典力学世界观要求它必须存在。更深的一层是：整个经典物理学大厦的意义根基——自然是可以被力学模型穷尽的——需要以太存在。如果电磁波不需要介质，那就意味着宇宙中有某种东西的运行方式，不是“一件东西推动另一件东西”的机械图景所能覆盖的。这扇门一旦被打开，不仅是光学理论要改写——物理学本身作为“力学地理解自然”的那种根本的自我理解，就要松动。以太的存在与否，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问题，而是整个学科的意义根基稳不稳固的问题。物理学家需要以太，不只是因为理论需要它，更是因为他们需要“物理学的方法可以穷尽自然”这个信念继续稳着——他们需要这把刀是能切透一切的。那个善的动因，是绑在这个学科使命上的。

于是，他们扶稳以太的每一个动作——设计更精密的实验去测量以太风、推导更精细的以太力学模型——同时包含了两个相反的意义。在显意识层面，他们在做正常的科学工作：检验假说、收集证据。但在存在层面，他们是在扶一个“我不需要扶它也稳”的东西——因为以太如果真的像他们相信的那样，是宇宙的客观构件，那它就不该需要他们这么费劲地去证明它。它应该自己站在那里。他们越用力去证明它，就越暴露它需要被证明——而每一个证明的动作，都在暗中增加那个被证明的东西的不确定性。这个自悖不是逻辑悖论，而是实践悖论：扶稳的动作，在执行“我相信它是客观稳固的”这一信念的同时，以自己的执行本身，证伪了那个信念——因为如果它是客观稳固的，它不需要你扶。你在扶，就说明它正在从你的指缝里漏下去。

现在给出这一运作模式的三条执行环节。

(1) 稳定诉求：追问者欲求一个绝对不依赖于他当下的追问行为而自存的终极稳定性——一个“我不扶，它也稳”的锚。在以太案例中，这个锚是“自然可以用力学模型穷尽”这一信念，以太是它在光学领域的代理。

(2) 扶稳动作的执行：追问者的追问行为本身——他的实验设计、理论推导、论文发表、教科书编纂——正是让那个“终极稳定性”作为一个可被讨论的概念而得以被扶稳的唯一条件。麦克斯韦、赫兹、洛奇、迈克尔逊——他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在亲手扶着那个他们想证明“不需要他们扶”的东西。

(3) 自拆台脚的盲视：他越用力追问，越在扶稳一个“我不扶它也稳”的幻影；他若停止追问，那个幻影连概念都不会有。他追到的，永远只能是自己的扶稳动作在极限处投射出的一个影子——但他把影子当成了他自己没参与的外部实体，并且对这个“把影子当实体”的认知操作，失明了。以太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之前的那几十年，就是这样一个被集体扶稳的影子——而扶稳它的那几十双手，在每一次加力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松动，但每一双手都以为是自己握得还不够紧。

这一层的运作不是个人心理现象。它是制度性的：一个训练有素、内部纠错机制健全的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几十年的制度性追问中，集体地、高度精密地执行一次手的自悖。他们不是在偷懒，他们是在用最大的勤奋和最高的智力，亲手扶稳了一个自拆台脚的概念——因为如果不扶它，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意义根基就会在那个缝隙处塌掉。他们的失明，不是智力缺陷，是存在处境的必然产物：他们被包孕在那个对机械论世界观深信不疑的认知惯性之内，无法在实验的零结果出现之前，就站到那个惯性之外去看见自己扶稳的是一团矛盾。而那个包孕他们的认知惯性，本身又是发生过程的后期结晶——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沉淀在物理学共同体中的“一切现象必须有一个力学模型”的方法论教条，成了他们握刀的那只手的无意识姿势。

3.3 第三层：时的遗忘——时间感上的活过程与死实体的系统错认

以太案例的第三幕，是它如何被“遗忘”——以及在这种遗忘中，它如何继续活在今天的物理学语言里。当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彻底放弃了以太，物理学家们迅速地、集体地将那段历史归档为“旧物理学的局限性”，然后继续用他们没有以太的方程组做计算。但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场”这个词替代了“以太”的位置——电磁场、引力场、希格斯场。场是什么？他们能写出场的方程，算出场的激发态，预测场的行为。但如果有人追问：“场本身是什么？它在真空中是什么‘东西’的什么状态？”标准答案是：场是自然界的基本实体，不需要进一步解释。这个“不需要进一步解释”，和当年以太被赋予“不可再追问”的自明性时，在逻辑结构上完全相同。它也是一个止步处——只不过这一次，止步处被包裹在一个更成熟、更自洽的数学形式里，刀的切痕藏得更深了。而当年扶着以太的那几十双手，它们的经验、它们的挫败、它们在零结果面前被迫直面自己伤口的那种存在性的疼痛——这些都没有进入物理教科书的正文。教科书只告诉学生：以太被实验否定了，相对论取代了它。至于那一代物理学家亲身经历的那个“我们扶了几十年的东西塌了”的发生过程——那个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至死不肯接受相对论的、捆在生命意义根基上的自噬体验——被“以太假说”这四个字做成了一个标本，陈列在科学史的年表里，不再咬人。

“时的遗忘”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将活的发生过程压缩为死的已完成实体——并以这个压缩后的实体替代活的发生的再执行——的系统性认知操作。它包含三个互相咬合的子过程。

第一个子过程：高频重复的知觉压缩。任何被感知为“实体”的稳定性，其底层实际上是一组极高频率重复发生的互动。物理学家们日复一日地设计实验、撰写论文、参与争论、反驳批评——这些动作每一件都是具体的、耗神的、带有不确定性的。但当它们被写入科学史时，这一大团交织不休的互动被压缩成一个干净判断：“以太假说被否定了。”就像一张树叶翻动的连拍被压成一张静止的照片，连拍里那些正在晃动的、即将断裂的、还在挣扎的树枝，全被省略了。这个压缩是认知的必然——没有它，历史就成为一团无法被整理的混沌。但代价是：被压缩出来的那个“实体”标签（“以太假说的失败”），贴上去之后就再也看不见标签底下那一代人的手还在抖了。

第二个子过程：标签的自立门户。被压缩出来的那个完成时标签，一旦进入语言系统，就获得了一个独立于它原始所指的语义生命。“以太假说的失败”在当代物理论文里，可以作为一句话被引用：“X理论可能重蹈以太的覆辙。”这句话里的“以太”，已经不需要再回调任何关于十九世纪物理学史的具体血肉。它只需要作为一个已知的、定了性的概念存在于句子里，就能完成它的语义功能——发出一个警告。追问者在使用“以太”这个词时，他不需要、也不会去想象迈克尔逊在实验室里熬夜对仪器做微调的那个凌晨。标签在和它的发生土壤断开之后，不仅继续运作，而且运作得极其高效——高效到追问者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从某段惨烈发生的死亡中提取出来的抽象物，而开始把它当成宇宙知识库里的一个现成标签来取用。这就是时的遗忘最关键的跃迁：不是“忘了标签是标签”，而是“标签在语言系统内部获得了自足的、不依赖被它指称的那段发生历史的运作生命力”——并在实践中取代了那段历史本身，成为后来者认知该段历史的全部内容。

第三个子过程：追问者本人参与了对那个标签的当下再生产。一个当代物理学家在论文中写“X理论可能重蹈以太的覆辙”时，他正在用这个标签做论证。而他的这个论证动作——写论文、投稿、在研讨会上提问——恰好在继续维持“以太”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可以被用来类比的概念的生命力。他以为自己在引用一个“已被认识完毕的历史事实”，但他没有看到，他的引用动作本身，正是那个“事实”在当代学术场域里被持续再生产的现场。以太并没有死在1887年。它被杀死于1887年，但它作为“被杀死的以太”这个概念，继续活在后来的每一次引用、每一次类比、每一次教科书修订中——而每一次这样的操作，都是对这个概念的“扶稳”，都在为这个概念在当代的语义场域里继续占据一个可被搜索、可被讨论、可被当做论据使用的生态位而注入能量。

这三个子过程——高频压缩、标签自立、参与盲视——合在一起，就是时的遗忘的完整运作。这个运作把我们带到了怀特海。怀特海（Whitehead, 1929）精准地指出了第二个子过程：那些被当作具体实体的东西，其实是人类从不间断的发生之流中抽象出来的稳定结点，然后把抽象物误认为具体物——“误置具体性谬误”是范畴错误。怀特海的这一步是地基，必须归功于他。在同一时代，柏格森（Bergson, 1907）以“绵延”概念正面攻击了第一个子过程：科学的时间是可度量、可分割的钟表时间，它将真实流动着的、不可切分的活的绵延，空间化为同质的一个个点，从而从根本上错失了生命时间的本质。怀特海说我们把抽象物当成了具体物，柏格森说我们把活时间压成了死刻度——二人合在一起，已经覆盖了时的遗忘的前两个子过程。

本文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往前走一步。本文要补上的是第三个子过程——参与盲视。怀特海和柏格森都指出了那个误认的内容和那个压缩的机制，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追问：那个正在指出这些误认的哲学家——怀特海自己、柏格森自己——他在用“过程”“绵延”这些概念去指出误认时，他的指出动作本身，是否正在参与对“过程”“绵延”这些概念的当下再生产？他有没有在批评旧形而上学的同时，把他自己正在执行的这个批评实践，豁免于被他自己的批评所揭示的那个处境之外？这个追问不是吹毛求疵。它有具体的实践后果：如果误认不只是历史上的一次范畴错误，而是每天都在被认知操作、语言习惯和制度实践重新制造——那么纠正它就不能只靠一次理论上的“指出”。因为“指出”这个动作，如果不伴以对“指出者自身也在参与制造误认”的觉知，就只是多贴了一张标签，并在贴标签的动作中重复了那个被标签所批评的误认。时的遗忘最深的那一层讽刺恰恰就在这里：一个哲学家在批评“误置具体性谬误”时，如果他认为自己已经通过这个批评站在了谬误之外，那他就亲手为自己的批评制造了该批评所揭示的那个处境——他刚刚掐掉的那朵枯花，正在他握笔的那根手指上重新长出来。

三层运作模式说完，必须立刻加上一段“再缠绕”，否则它们就有被误读为三个独立模块的风险。这三层不是三个分开的“方面”，而是同一个追问动作在逻辑、存在、时间三个维度的同时性展开。你在用概念刀切出“起点”的同时（工具自噬），就在扶稳一个“不需要扶”的幻影（手的自悖），而这个幻影已被你的语法冻结成完成时（时的遗忘）。一刀下去，三事齐发。当麦克斯韦写下“电磁波在以太中传播”时，他同时在逻辑上制造了一个日后会咬死经典物理学的概念伤口（工具自噬），在存在上用这个伤口扶稳了“自然是力学地可穷尽的”这一学者使命的意义根基（手的自悖），并在语法上把那个正在被制造的、还流着血的概念伤口，写成了一句过去时的、定性的、干净的陈述（时的遗忘）。不是先有了伤口，再有人去扶它，再有人忘了它是伤口。是那一行字写下去的笔尖本身，就挡在眼睛和伤口之间——写的人看不见，因为他正在写。

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贯穿全文的以太故事，给它一个暂告段落的句点：以太不是被迈克尔逊和莫雷“发现为假”的。以太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发现为真或假”的对象——它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由一个特定认知惯性所驱动的追问方式，在触及那个追问方式自身无法消化的发生源头时，投射出的一个集体影子。物理学共同体用了数十年时间扶稳这个影子，然后在一次实验的逼迫下，被迫承认他们的手一直在扶着空气。他们扶稳影子的那几十年的集体实践，才是概念的自噬结构在物理科学中最完整的一次肉身显形。

四、碰撞与切割：确立阐明的独立边界

上面展开了概念的自噬结构的三层运作模式。但要确立这一阐明的独立边界——它究竟在哪个精确的点上比已有的相近论述多走了一步——不能只靠正面铺陈，还必须让它经历一次“碰撞检验”。本节将引入三组关于“发生”的独立洞察，让它们在碰撞中互相逼出各自的盲区，并在这一碰撞过程中，逐个完成对海德格尔、哥德尔、康德这三个在同一片山脊上攀爬过的最近邻的切割。这样做的好处是：切割不再是与一尊尊孤立的雕像分别对打，而是在同一个深层矛盾的不同侧面，同时展示每个近邻各自看见了什么、又各自在哪里停住了——而本文的阐明代出的那一步，恰好是他们合在一起也没能跨过去的那道苔藓。

在每次切割之前，本文必须先做一件事：以最大程度的共情，清晰地陈述该哲学家在其自身视角下最具说服力的论述，并明确指出“他在此处已经看见并说出了什么”。这不是礼仪性的致敬，而是实质性的学术诚意——只有当你充分承认对手已经抵达的深度之后，你指出的那个“他停住的地方”才具有击穿力。在此之后，本文还需要做另一件事：对自身的切割动作进行一次自我切割，以防止切割本身滑入它正在揭示的那个自噬处境。这不是修辞上的自谦，而是本文所揭示的那个处境对本文自身的必然约束——如果一个阐明了“追问者执刀的手总是被自身豁免”的论述，不在自己执刀切割时也低头看一眼自己的手，那这篇论文就是它自己所揭示的那个处境的最完整样本。

4.1 第一对碰撞：“发生的最初动因”之争与海德格尔的切割

第一组洞察主张，宇宙的最深结构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不是物质，不是关系，而是那个让物质从关系中露出、让关系因物质而能被指认的、持续不息的生成动作本身。它把“发生”推到了比结构与关系都更原始的位置：结构与关系是同一个发生动作的两面，像手心与手背，没有谁先谁后，只有同时互生。

第二组洞察则更尖锐地坚持：如果一定要在物质与关系之间选一个作为最初的动因，必须是关系在先。它的硬核论证是：关系不是物与物之间外加的连线，而是关系的特定张力形态，才把后来被我们称为“物质”的东西，从一片混沌中逼了出来、稳了下来。物质不是关系的承载者，物质是关系的结晶物。

当这两组洞察同时盯住“最初的动因”这个靶心时，它们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第二组会追问第一组：那个让结构与关系首次咬合的“发生动作”，在没有任何先在的结构或关系时，是谁推动了第一次差异的推进？如果你的回答是“发生动作本身就是第一推动”，那么追问会进一步咬紧：一个没有任何差异可以抓取、没有任何载体来执行的“纯粹发生动作”，它发生了“什么”？如果它什么都没发生，这与什么都没发生有何区别？反之，第一组也会追问第二组：如果关系先于物质，那是什么东西在“发生关系”？关系要运行，必须至少有两个可以被区分的项——哪怕这两个项只是同一个场的两极张力。那么这两极的差异张力本身，不正是“结构”的最初雏形吗？关系的载体在那一刻，难道不正是某种最原初的结构性差异吗？

这对撞的深处，就是我前面在工具自噬那一节描述的那个切口。追问者用来切出“起点”的概念工具，要求“形式”和“内容”是可分离的——形式是那个“发生动作”本身（它必须具有绝对先在性，否则就不是真起点），内容是那个动作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是可辨认的差异与关系，否则发生动作就没有“发生了什么”的资格）。但真正的、先于分化的发生源头，恰恰没有把这两者先分开再合并的那道工序。它不是先有纯粹的“推动”，再有被推动的“东西”——它是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瞬间，一推就推出了东西，推出东西的同时才完成了那个推。追问者试图用“动因”这个概念去切它，而“动因”这个概念本身就预设了“施体”与“受体”的分离——哪怕两者被说成“不可分”，这个“说成不可分”的表述本身，就已经在语法上把它们先分开了。在此，我们可以直接执行工具自噬的三条环节来做精确刻画：追问者的概念工具（“动因”“先在”）需要从发生中切出一个有边界的起点（工具的切割需要）；但那个先于一切分化的发生源头没有任何可供切割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边界（对象的不容切割）；于是追问者用“动因”这个词在源头上强行划下一个只有刀才能认得出的边界——然后把这边界当成源头的真实面目来追问（自造伤口的盲视）。

正是在这个切口上，海德格尔与本文的分野得以精确标定。

致敬与聆听。海德格尔（Heidegger, 1927）是迄今为止对“追问者遗忘自身”这一问题想得最深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劈头就问：我们问“存在是什么”时，总是把存在当成一个存在者来对待——当成一个可以摆到面前、用范畴去规定的东西。而那个正在发问的“此在”，却被跳过去了。“存在的遗忘”不是忘了某个知识点，而是西方形而上学整个追问方式的结构性后果：追问只盯着被问者，忘了发问者自身的在世方式。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沉沦”的分析尤其具有穿透力——沉沦不是被动地掉进一个外部陷阱，而是此在主动执行的、从自身能在面前的逃避。这一点上，早期海德格尔已经看见了追问者的失明不是降临在他身上的，而是他亲手执行的。海德格尔以巨大的哲学勇气，在这一刻把追问者的手从暗处拉到了灯下。

切割。然而，海德格尔在三个关键点上停住了。

第一，遗忘的“谁”是谁。海德格尔后期越来越把遗忘的最终根源归于“存在本身隐匿”——是存在自己撤回，我们才忘了它。这一倾向带上了诗性的、几乎是神谕般的被动性。而本文揭示的是一个可操作的认知处境：追问者不是在等待存在涌现，而是他自己在进行追问操作的每一刻，都在主动执行一个“豁免自身”的认知压缩动作——他用他的概念工具去切发生的源头，工具在源头上制造了它不能消化的伤口，而他对这个制造伤口的动作本身，失明了。这个遗忘不是宇宙的退隐，是追问者自己的手在替他行窃。海德格尔更倾向于问

“存在如何给出自己又撤回自己”——一个关于给出者的叙事；而本文问的是“追问者如何用概念工具在源头上制造了工具不能消化的伤口，然后把伤口当成源头的真实面目来研究”——一个关于操作者的阐明。海德格尔的那个遗忘是被给予的——追问者是被动的失忆者；本文的遗忘是亲手执行的——追问者每问一次，就重新切一次、重新制造一次伤口、重新失明一次。

第二，出路何在。海德格尔给出的出路——“倾听存在”“泰然任之”“诗与思”——在操作上是高度精英化的、无法被转译为可普及的具体实践。本文不声称提供一个比海德格尔更好的“出路”，但它至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处境描述，使得这个“遗忘”可以被当成一个具体的认知处境来面对和研究，而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被沉思的哲学母题。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海德格尔自己在后期逐渐滑向了一种对“本有”的近乎实体化的叙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站在“新时代”门槛上宣告旧形而上学终结的先知角色。这个站位，恰恰是他自己早期所批判的那种位置——把自己豁免于批评之外，宣称自己说出了“存在本身的话”。他有没有越过自己指认的那块苔藓？也许在最好的那些时刻他越过了，但在那些他以为自己已经越过的时刻，他可能踩得比任何人都深。

自我切割。在此必须暂停。当我切割海德格尔“将遗忘归于存在的隐匿”时，我是否正在将“遗忘的根源”归于追问者的工具处境？我是否在用“操作者阐明”替代“给予者叙事”，从而为我自己制造了一个“我比海德格尔更清醒”的扶稳姿态？如果我这套阐明是对的，那么此刻做出切割的我，必然正在用一套来自生成机制传统的概念（“工具”“处境”“操作者”），在一个它无法消化的终极起点上制造伤口——而我对此伤口可能同样失明。我切割海德格尔的那一刀，切开的也许不是他身上的苔藓，而是我自己的刀在我自己制造的一个叫做“海德格尔的局限”的对象上留下的切痕。切割不是终点，只是让伤口可见。下一个走到这山脊上的人，会先看见我的刀背，再决定要不要踏上去。

4.2 第二对碰撞：“稳定性来源”的解释权之争与哥德尔的切割

第二对碰撞发生在另一个维度。第一组洞察在坚持发生动作的原始性的同时，还必须回应一个关键挑战：如果一切都在发生中流动，那么世界为什么呈现出如此坚固、持久、难以撼动的稳定结构？它的回答是：稳定性本身不是流动的例外，而是流动在特定条件下被锁定的功能，是发生的一个进行时的状态，而非完成时的事实。第三组洞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角度。它的核心意象是“咬住”：不是积木决定了结构，而是积木相互咬住的那个动作，让积木在那一刻成为能咬住别的积木的积木。

当这两组洞察同时盯住一个稳定的显现态，它们之间的张力就显现了。第一组强调，这个制度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它在持续的演化中找到了一个将张力锁定在可承受范围内的节律。第三组则会强调，它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网络——无数个体每日的遵从、执行、惩罚越轨——在持续地“扶”着它。两者各看见了稳定性的一只脚，但都无法用自己看见的那只脚去解释另一只脚怎么站住。

这对撞的深处，恰好是“手的自悖”踩准的那个点。一个追问者追问“稳定性的最终根基是什么”时，他内心真正在追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善基——一个不需要他亲手去扶的、自己站着的终极稳定。但无论是“锁定功能”的解释，还是“咬住网络”的解释，两者都共同指向了一个他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任何稳定性，都同时需要发生的节律锁定和当前网络的持续性扶稳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而这两个条件在时态上彼此矛盾：锁定是完成时的（它沉积下来），扶稳是进行时的（它必须此刻正在被做）。执着于寻找那个“唯一的根基”，不如去描述二者如何同时参与每一个稳定态的日常再生产。如果稳定性的根基本身就是一个完成时与进行时之间的不可消弭的缝隙，那么追问者想要的那个“没有缝隙的、完全自己站着的终极稳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他用自己的扶稳动作投射出的幻影。他越想用理论论证这个幻影的实在性，越在亲手扶着这个幻影。

这个闭环在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映照下，获得了一层额外的锋利度。

致敬与聆听。哥德尔（Gödel, 1931）证明，任何足够强大、自治的形式系统，都必然含有在该系统内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命题。而且，系统的自治性不能在该系统内部被证明。这个定理揭示了自指结构在形式系统中的不可消除性：当一个形式系统试图完全地、一致地描述自身时，它会在某个命题上塌掉——不是因为这个命题是错的，而是因为系统内部没有足够资源来裁决它。哥德尔的证明，在数学史上第一次用无可辩驳的精确性，给出了“一个系统无法在其内部完成对自身全部真理性的奠基”的刚性边界。这个边界，不是暂时的技术瓶颈，是形式系统本身的必然属性。哥德尔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这样一个结构：任何一个自指的追问，都会在某一刻遇到一个系统内部无法裁决的命题——这个命题是真，但不可证。这个结构在逻辑学中的精确性，至今无人超越。

切割。然而，哥德尔定理揭示的是形式系统的界限。它不关心、也不蕴含任何关于“存在者”本身处境的推论。一个数学家理解了哥德尔定理，可以在智力上被震撼，但他的生活、他的自我理解、他面对痛苦和死亡的方式，完全可能毫发无损。而本文追问的是：这个逻辑上的不完备，在具体存在的追问者身上，是以什么样的处境形态被经验、被反应、被处理或被否认的？当一位物理学家被告知“你所寻找的终极理论可能永远找不到自治的内部奠基”，他不只是碰到了一个逻辑定理，他是碰到了一个关乎他毕生工作意义的存在性威胁。他可能会否认、可能会压抑、可能会转而攻击质疑者的动机——这些反应模式，正是“手的自悖”的活体样本：他在用不断追加的研究行为扶稳他的“终极理论”理想，同时又无法承认他的扶稳动作本身就是对这个理想的证伪。哥德尔告诉我们，自指让某些事在原则上不可

能。本文追问的是：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要如何在每天的生活里与这个“不可能”共处，而不至于拆掉他自己赖以生活的那些临时稳定性？边界是一道数学证明，处境是一层必须在每一天被重新承受的肉身重量。

自我切割。当我用哥德尔的不完备性来映照“手的自悖”时，我是否正在利用一个精密的形式定理来给我自己的存在论阐明代“穿上数学的外衣”？我是否正在用“哥德尔已经证明……”这种表述，来让我的读者产生一种“这已经被逻辑学证实了”的错觉——而实际上哥德尔定理证明的是形式系统内部的自指困境，与我在物理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存在处境中揭示的那个“扶稳动作的自悖”，在逻辑类型上有本质区别？如果我把这种本质区别模糊掉，我就是在用哥德尔的权威，扶稳我自己那个还不需要面对最锋利攻击的阐明代。

4.3 第三对碰撞：“结晶”与“咬住”的时态之争与康德的切割

第三组碰撞更直白地撞在了时态上。第二组洞察的核心意象是“结晶”：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冷却、锁定，然后一个崭新的、固态的“物”出现了。第三组洞察的核心意象与此针锋相对：不是“结晶”，而是“咬住”——从来就没有什么“完成时”，每一个看似是过去演化遗留下来的产物，其本质都是一个必须被当前关系网络持续扶稳的活过程。

这两组意象的碰撞，逼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宇宙中没有纯粹的“历史遗迹”。结晶只是咬住动作慢到肉眼无法察觉时产生的一个知觉幻象。正是在这个时态的悬崖边上，康德的身影出现了。

致敬与聆听。康德（Kant, 1781/1787）以一人之力把西方哲学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划下了一条此后两百年无人能完全绕开的边界线：我们只能认识现象，物自体不可知。这个划界与本文的阐明在表层上有极高的亲和度——二者都在说，人的认知有一个内在的、无法靠继续累积知识来突破的结构边界。康德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认知者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他在认识任何对象时，已经先带着一副不可摘除的眼镜（时间、空间、因果性）。这副眼镜使得他所认识的一切，都已经是经过认知形式处理之后的“现象”，而不是“事物本身”。康德的划界是哲学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对认知者自身结构局限的指认——在他之前，哲学家追问的是“外部世界是什么”；在他之后，这个追问被不可逆地转向了“认知者能追问到什么程度”。

切割。但康德和本文站在这个边界的截然不同的两边。对康德而言，那个边界是固定的、外在的——时间、空间、因果性是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因为它们知识可能的条件，所以它们也是知识的限制条件。但本文的看法则是：这幅眼镜不是固定的、外在的、永远摘不掉的硬件。它是发生过程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的一种极其坚固的、几乎不再被个体主动修改的路径惯性。它不是一堵宇宙的外墙，而只是一条当前发生条件锁定的河床——河床不等于河岸，河床可以变，只是变得极慢、极难、需要极大的能量输入。康德把边界称为“先天的”，这个“先天”字眼封住了进一步追问的可能——它成了一个解释的终点。但本文追问的是：这个“先天”，它是在什么发生条件下变成“先天”的？

皮亚杰（Piaget, 1937）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婴儿的世界并没有清晰稳定的因果范畴——那些范畴是儿童在多年的感觉运动交互中一步一步建构出来的。它们不是出生时就在那里的硬度，而是发生过程跑到一定圈数后，在有机体身上沉淀下来的极其坚固的认知惯性。康德以为画下边界的人，已经在边界外面了。本文则指出，画下边界的那个人，他手中的画笔、他画线的那个动作、他用来判断“这条线画够了”的判准，恰恰都是边界内的发生产物。他站在边界上宣判边界外的不可知，但他没有看到——他宣判的那个站姿，本身就是边界的一部分。那块苔藓，康德踩上去了，和所有前人一样，滑倒在自己最天才的那一步上，毫不知情。

自我切割。我切割康德“将边界视为先天固定”时，我是否正在用“生成论”这把刀，在康德身上切出一个“历史局限性”的伤口——然后自我安慰说，我已经通过指出他的历史局限，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不受历史局限的位置上？如果我对这个念头有一秒钟的默认，那我就已经在自己最得意的切割动作里，执行了一次标准的自噬。因为“生成论”本身也是发生过程的后期结晶——它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站在历史外面的特权。

五、最强劲敌意近邻：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正面切割

至此，我已经切割了海德格尔、哥德尔与康德。但有一个身影，比这三者都更危险地逼近本文的核心地带——他几乎已经把本文想说的最要紧的话说过了，而且说得比我更少、更硬、更不容辩驳。这个人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不正面处理他，“手的自悖”这一层就悬空了——读者完全可以问：这不就是把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和“河床”的论述换了一套修辞又说了一遍吗？

因此，这一节必须独立设置。它要做四件事：第一，在开头显式设置“不可还原硬校验”段落，让读者在进入维特根斯坦讨论之前，就已经清楚本文的核心命名与已有概念之间的精确分界；第二，诚实承认维特根斯坦已经在什么意义上覆盖了同一片问题域；第三，精确指出他停在了哪里——在哪个点上，他的论述虽然极其深刻，却没能再往前走一步；第四，在此基础上，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实践进行一次深度交锋——一个像维特根斯坦那样，其哲学实践本身就是对“站姿”的持续松动的人，他是否已经以不命名的方式，完成了“手的自悖”所命名的事情？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本文的独立理论收益就缩小为“给了它一个名字”——本节必须在这一生死交锋中，逼出“手的自悖”是“新骨”而非“新衣”。

5.0 不可还原硬校验

在进入维特根斯坦之前，有必要先显式交代本文的核心命名与几个最容易被读者拿来替代它的已有概念之间的精确分界。

可能有人问：这不过是维特根斯坦“河床”说的哲学翻版，或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存在论应用，再或海德格尔“存在遗忘”的现代改写。我们的回应是：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规则与遵守规则的同源，以及“河床也是河水做的”，但他没有追问那个指着河床说“它是河水做的”的人，他此刻站在哪里——他的指认动作本身，是否正在河床上增加一层新的地质沉积？哥德尔证明了形式系统的边界，但他不刻画边界内那个不得不面对意义崩塌的追问者的肉身处境——一个人知道他的系统无法自证自洽之后，他是怎么在第二天早上继续去实验室的？海德格尔揭示了追问者对“存在”的遗忘，但他把遗忘的根源最终归于“存在本身的隐匿”——追问者是被动的失忆者；而本文的“工具自噬”揭示的是，追问者每问一次，就主动重新切一次、重新制造一次伤口、重新失明一次。他不只是“忘了存在”，他是每一次追问都在重新执行那个遗忘。自指悖论是逻辑上的封闭循环——它不涉及追问者的手，不涉及他获知这个悖论之后的存在性反应，不涉及他在获知之后继续做研究的那个“假装忘了刚刚知道的”的日常操作。“概念的自噬结构”命名的，不是“自指”的逻辑循环，是“自噬”的存在闭环——追问者用从发生的河里捞出的概念刀，亲手在被追问的源头上制造了刀无法消化的伤口，然后把伤口当成源头的真实面目来研究，并且对这个制造伤口的动作本身，失明了。这个闭环里有手，有刀，有伤口，有一个正在痛却不知道为自己为什么痛的人——这些是自指悖论、范畴错误、观察者效应都没有覆盖的辨别面。

5.1 维特根斯坦已经说了什么：规则是被“做”出来的，不是被“奠基”出来的

致敬与聆听。后期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53）在《哲学研究》中对“遵守规则”的分析，在二十世纪哲学中几乎是绕不开的基石。它的核心洞见可以用一个场景来呈现：一个小孩在学习“加2”的数列——2, 4, 6, 8……老师教了他几个例子，然后让他自己继续往下写。写到1000之后，他写下了1004, 1008, 1012。老师纠正他说，你错了——1000之后应该是1002, 1004, 1006。孩子困惑地问：可我一直加2啊，你怎么知道我之前那几个例子中的“加2”，在1000之后就应该是1002，而不是1004？

这个问题不是孩子在耍赖。它触及了一个极其深的结构性问题：任何一个规则，无论是数学的、语言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通过有限次数的示范来穷尽它在未来所有新情况中的应用。你可以再给更多的例子来“解释”规则，但每一个“解释”本身又需要被解释，这会导致无穷后退。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石破天惊的：规则不是一种摆在那里的、独立于使用者的“意义轨道”——它必须被遵守规则的实践本身所维持。没有“遵守”这个动作，就没有“规则”这个东西。“遵守规则”是一个实践，是共同体的一种习俗，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已经把“稳定性不是被发现的实体，而是被实践动作所扶稳的过程”这句话，说得比我迄今为止说过的任何话都更简洁、更彻底。

他在《论确定性》（Wittgenstein, 1969）中进一步用“河床”的比喻深化了这个洞见：我们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像河水一样在流动，但河床——那些我们从不怀疑的、作为一切怀疑与确认之前提的确定性——似乎是固定的。“似乎固定”这四个字是关键。因为维特根斯坦紧接着指出，河床本身也是可以移动的——只是移动得极慢、极难察觉。没有哪一块河床从宇宙诞生时就硬在那里。它也是河水——更老的、更固结的、被共同体一千年又一千年地踩实了的河水。维特根斯坦以巨大的哲学诚实，亲自拆掉了自己前期《逻辑哲学论》试图建立的那座水晶宫殿——他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对“理论建构的自我豁免”的否定。他没有站在语言游戏之外描述语言游戏，他的整部《哲学研究》就是在语言游戏内部松动语言游戏的一次实践。

5.2 维特根斯坦停在了哪里：从“河床是河水做的”到“我此刻正踩在河床上测量河水”

我的回答是：维特根斯坦揭示了一个关于语言与实践的极其重要的结构——规则与遵守规则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那个看似是地基的“河床”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可移动的。但他揭示这个结构的方式，仍然是一个哲学家的方式：他站在那个正在流动的河水和正在缓慢移动的河床的旁边，用极其敏锐的眼光看出了二者的同源性，然后用极其精确的语言把这个看出说了出来。《哲学研究》是一个描述，一个极其深刻的描述——描述了一个观察者从外部看到的实践的结构。

但“手的自悖”要追问的，是另一个方向的问题。它不是问“河床是什么做的”——维特根斯坦已经回答了：是更老的河水做的。它问的是：“那个正在指着河床说‘它是河水做的’的人，他此刻踩在哪里？”如果他踩在河床上来指出河床是河水做的，那么他此刻指认河床的那个动作——写哲学书、在研讨会上发言、在思想上推翻旧哲学——本身是不是也在那块被他指认为“其实是河水”的河床上，增加了一层新的地质沉积？如果是，那么他说出的那个“真相”（河床是河水做的），与他执行那个“说出”的动作时所用的站姿（他稳站在河床上以说出河床是河水做的），这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或逻辑诡辩。它有极其具体的可操作后果。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反复批判哲学家的那种“将自己豁免于语言游戏之外”的幻觉——哲学家以为自己是在用元语言描述语言游戏，实则他自己的描述动作本身也是一个语言游戏，也受制于同一个语法。他批判了这种豁免，但他批判的方式，仍然是那个经典的哲学家姿势：他站在水边，告诉水里的人“你们都在水里”——但他没有在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低头看一眼自己的脚。他把自己写哲学书的那个实践，与他所描述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河床”这些概

念之间的关系，留在了暗处。

这不是在指责维特根斯坦虚伪。他的实践——用那种高度格言化、拒绝体系化、反复自我否定式的写作——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中，最接近于“不在河床上再多筑一层”的一种努力。他的写作风格本身，就是对哲学家站姿的一种持续松动。但松动不等于交代。他松动了那个站姿，但他没有用他的哲学语言去命名那个站姿本身的反身处境——即，指认“河床是河水做的”这个指认动作，在存在论上与被他指认的对象处于同一层。“手的自悖”要命名的，正是这个反身处境的精确结构：一个追问者在指出“一切终极稳定都是被扶稳动作所维持的幻影”时，他此刻用来做出这个指认的——他的概念、他的论证、他写作与发表的整个学术实践——是否正在对他所指认的那个“幻影”执行着一次新的、更精微的扶稳？如果是，那么他的指认，在说出一个真相的同时，也在这个真相的对面制造了一个新的盲区——而他对这个制造盲区的动作本身，失明了。

5.3 深度交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实践是否已“不命名地完成”了“手的自悖”？

现在必须进入那场最危险的较量。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实践——格言体、拒绝体系、自我否定、放弃理论建构——是否已经以不命名的方式，完成了“手的自悖”所命名的事情？如果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后期哲学实践，其目的恰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脚在河床上踩死——他每写一句话，都同时用下一句话松动它；他每提出一个哲学洞见，都拒绝把它凝固成一套可以被后人引用的“维特根斯坦主义”——那么，他是否已经在他自己的哲学实践中，实现了“觉知到自己的手正在扶稳”这个本文核心要求的状态，只是没有给它一个概念名字？

这是一个必须正面接住的挑战。我的回答分两层。

第一层，实践层面。我承认，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实践，在其最好的那些时刻，的确以一种极端警觉的方式，持续松动了他自己的哲学站姿。他不筑体系，不定教条，不用大写的哲学名词镇场子。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持续的反身操作——让读者看见哲学家正在做语言游戏，包括正在写《哲学研究》的那个哲学家。在实践层面，维特根斯坦可能已经走得比任何一个西方哲学家都更远。在这一点上，本文不是“超越”维特根斯坦，而是以命名的方式，去言说一种维特根斯坦以实践方式去执行的东西。

第二层，命名层面——实质性差别在此。维特根斯坦的实践，在其最警觉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一种“松动站姿”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不是必然的——它完全可以被读者误读为一种更精致的哲学姿态：“我不筑体系，所以我比那些筑体系的人更清醒。”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身后的分析哲学传统里，大量学者正是以“我们是维特根斯坦式的——我们不追求大写的真理，我们只做语言分析”为姿态，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不再需要被追问的认知舒适区。“回到粗糙的地面”被误读成了一种不需要再紧张、不需要再自反的终点，而不是一种需要被不断重新选择的紧张状态。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实践或许警惕了这一点，但他的实践没有阻止他的追随者们把“不筑体系”本身变成一座新的河床——因为他的实践没有在概念层面上把这个风险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而让它可见。命名的功能，正是让它可见。“手的自悖”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追问者获得一个比“回到粗糙的地面”更高级的终点，而是为了让“回到粗糙的地面”这个选择本身，也暴露在被反身审视的视野之内——因为那个“回到”，也可能正在被一双以为自己已经上了岸的手，悄悄扶稳成一个新的、“不需要再被追问”的锚。

维特根斯坦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示范，但示范不能替代命名，因为示范必须被每一个后来者从零开始重新解读，而命名可以在概念传承中，以不可被直接跳过的硬标识标记，存在下来。维特根斯坦做了一辈子松动站姿的实践，但“站姿的松动”这个概念，却不是他命名的——是我。而我命名的这个动作，恰好让“站姿松动”这件事，从一个只能被少数有天赋的读者从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中体认的晦涩实践，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明确讨论、明确检验、明确在日常追问中自我对照的可操作概念。这不是“多给了一个名字”，这是把一个只能靠默会传承的实践，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显式处理的对象。能够指认一种处境，和能够以行动回应这种处境，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各自需要不同的工具。刀背上的铭文，和持刀的手的姿势，是两件事。维特根斯坦给出了手的姿势的极致示范；本文给的是刀背上的铭文。

5.4 “手的自悖”独立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收益

在这个交锋的基础上，可以清晰地列出三项独立的理论收益。

第一，它把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实践”领域拉到“存在处境”领域。维特根斯坦讨论的是：规则如何被实践维持，以及那个看似最稳的“河床”如何也是实践的历史沉淀。这是一个关于语言和社会实践的外部描述。“手的自悖”讨论的则是：一个正在执行某个存在论上自反动作的人——他在追问“终极稳定”时，他本身就处在这个追问的后果之中——他的那双正在执行追问的手，与他所追问的那个“稳定的根基”之间的关系。这个追问已经超出了语言的疆域，进入追问者的自我构成：他的学术身份、他这辈子的意义感、他面对死亡的恐惧。一个哲学家在写《哲学研究》时，他的“手”不仅是在维持一个语言游戏的规则，而是在维持他自己作为一个“看透了语言游戏的人”的自我认同。后者是存在的重量，前者只是实践的规则。

第二，它为“我该怎么活”这个跟进追问提供了一个维特根斯坦那里找不到的立足点。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静的终点：语言游戏没有外在的奠基，哲学的工作只是“把苍蝇从瓶子里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回到日常语言的粗糙地面上，那里就是一切。这句结语有强大的镇定力，但它不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那个被放出瓶子的苍蝇，如果它忽然意识到，它此刻停驻的那片“粗糙地面”（日常语

言、生活形式、常识确定性)本身也是河床——而它停驻的那双脚,正在那片河床上继续施加压力——它该怎么面对这个事实?“回到日常生活”本身,会不会成为另一座更隐蔽的、更不容易被自我审视的哲学庇护所?维特根斯坦的那个“回到”,在姿态上是朴素的、谦逊的,但当它被一个哲学共同体当成“这就是最终答案”来接受时,它就变成了一座不需要再被怀疑的河床——一座由“放弃追问终极根基”这件事本身筑成的河床。而“手的自悖”逼问的是:那个“放弃追问”的动作,有没有可能也在每一次被执行时,悄悄地为自己造了一个“我不再需要被追问”的豁免空间?如果没有这个逼问,“回到日常”就可能成为最精致的自噬——不是用刀切,而是把刀藏进抽屉里,然后忘了抽屉在哪里,并安于这个遗忘。

第三,“手的自悖”给出了一个比“河床”更动态、更直接指向操作者自身的意象。维特根斯坦的“河床”,是一个自然意象——它好就好在它没有施动者。河水冲积、沉淀、固化——自然过程,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这符合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哲学气质:不要去找一个该为语言幻相负责的“主体”,因为那个“主体”本身也是语言幻相。“手的自悖”则刻意使用了一个有施动者的意象——“扶稳”是一个人的手正在做的动作。这不是在复活一个笛卡尔式的主体,而是在说:当一个人——他的名字可以是维特根斯坦,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在使用概念去追问那个终极稳定时,他的手正在做一件具体的、可被描述的事情:他在写、在论证、在投稿、在反驳。这些东西不是自然过程,它们是操作,是选择,是可以在每一刻被接受或修改的动作。指出这双手,不是为了谴责它,而是为了让它可见。让它可见,不是为了让它停下来,而是为了让那个正在操作它的人,至少知道自己的手此刻在哪里——是在水面上,还是在河床上,还是正在自己踩着的那块河床上继续堆石头。

这就是“手的自悖”比维特根斯坦的“河床”多走的那一步。维特根斯坦说出了河床也是河水——这是那三个运作模式中的第三层(时的遗忘)的机制。他没说出来的,是第一层与第二层在追问者手上的联合操作:追问者不但把河水误认成了河床,而且他用来指出“河床是河水做的”的那个站姿,本身就在为河床增添新的地质层。“手的自悖”要命名的,不是河床与河水的同源——那已经被维特根斯坦说尽了——而是那个站在河床上指认河床的人,在他的指认动作中制造的新的、更隐秘的自我豁免。

因此,本文与维特根斯坦的切割可以这样概括:维特根斯坦揭示了“河床也是河水做的”——这是语言实践层面的重大洞见;本文追问的是“那个指着河床说它是河水做的人,他此刻正踩在河床上”——这个反身处境涉及的不是语言的结构,而是追问者的存在处境:他用来做出“真相”陈述的那只手,正在那个陈述所陈述的对象上制造着新的盲区。维特根斯坦给出了外部描述,本文给出了内部处境。这不是替代,是推进。刀背上的铭文,和持刀之手的姿势,是两件事。维特根斯坦给出了持刀之手的极致示范——他用一生的哲学实践告诉世人,手可以如何不踩死;而本文在刀背上刻下铭文,让后来者在接过这把刀之前,就能先读到刻在刀背上的那句话:刀与伤口同源。一个人可以不认识字,却能以正确的方式握刀;但当他放下刀之后,后人如何知道这把刀该怎么握?铭文不是刀,铭文是对刀的记忆,是让刀在换了手之后,还能被认出来的东西。

六、跨学科推衍与射程标定

一个自称揭示出“追问者工具处境”的阐明代,如果只在一个哲学讨论的真空中打转,那它就什么也不是。它必须能在追问者最活跃、最具体、最远离哲学书斋的实践场域里,显示出它作为一个阐明的解释力——不是把阐明代当成高帽子去套所有现象,而是用它去照亮那些在这些学科内部依据既有范式无法被精确识别、或者被错误归类的问题。

在展开四段推衍之前,必须先补入一个被第一版忽略的关键对话场域——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认知与预测处理理论。不完成这个对话,本文在当代学术格局中的理论坐标就会留下一个危险的空白:读者完全可以问,“这不就是具身认知或预测处理的一种哲学版阐述吗?”

与认知科学的深度对话。近二十年来,具身认知理论系统性地挑战了将认知视为大脑内部符号运算的传统范式,主张认知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涌现过程,离不开发生情境。预测处理理论则进一步提出大脑是一台贝叶斯预测机器,感知是预测误差最小化的过程——世界不是被被动接收的,而是大脑主动生成的“控制幻觉”。这两股思潮在认知机制层面确实将认知从“发现”转向了“生成”,它们正确地看到了观察者不是被动的镜子,而是要主动参与世界的建构。然而,这一路径在处理追问者的存在性焦虑与意义诉求时,存在一个空档。具身认知与预测处理把观察者纳入认知模型,但这个“观察者”是一个处理感知信号、执行动作指令、减少预测误差的信息处理系统。它没有面对死亡恐惧,没有被意义崩塌威胁,没有在深夜醒来质疑自己毕生工作的根基。它生成预测,但不承受“这个预测如果错误,我整个自我认同会坍塌”的存在论风险。而本文揭示的“手的自悖”所刻画的追问者,恰恰不是一个正在最小化预测误差的贝叶斯大脑,而是一个正在用自己的追问行为扶稳一个“我不需要扶”的意义锚的存在者——他的那个扶稳动作里,有他毕生的学术身份、他对抗虚无的方式、他对稳定性的那个善的渴求。这些作为具体的、有死的人的存在性变量,是认知科学的抽象模型目前无法穷尽的。因此,本文的阐明并非与认知科学竞争,而是为它提供一种它尚不具备的维度——追问者的存在处境是需要被纳入认知模型中的一个独立变量。未来的认知科学如果要解释“为什么聪明人集体性地坚持错误但保持自我认同的理论”,将不得不处理这一变量。通过这次对话,本文的理论坐标得以精确标定:本文的阐明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认知机制,而是在既有认知机制之外,单独标出了追问者所负载的、那些不可被还原为信息处理的、有死的存在者所特有的存在性负累——并指出正是这些负累,在每一次追问的深层,驱动了扶稳、盲视与自噬的重复发生。

以下四段推衍,各瞄准一个学科的根本问题。最后用一个反向检验标定阐明的射程——承认它在哪里不该多嘴。

6.1 物理学：观察者是工具自噬的尖端样本

在第二节的第一幅透视图与第三节以以太为核心的经验线索中，这个问题已得到充分展开。此处只需追加一笔理论补充。当代物理学对量子引力（如弦论与圈量子引力）前沿的探索，呈现出一种引人深思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是数学上的持续推进：标准模型的扩展、全息原理、AdS/CFT对偶，以及关于时空本身是否是涌现现象的激烈辩论。第二层则是诠释层面的持续空缺——在这些高度形式化的理论建构中，“什么是实体？”“什么是时空的‘本质’？”恰恰是那些被数学模型系统性绕开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正是“闭嘴计算”策略在当代的顶级延续：不是不知道该问，而是共同体的学科实践已经将“不问”固化为一种使常规科学得以稳定积累的操作性前提。这一现象可以在本文的框架中获得一个精确的描述：那些在诠释层面无法被现有概念刀切开的“源头”——时空的本性、量子态的实在性、测量难题——被包裹在一层数学形式之中，刀继续切，越切越精密，但那个在刀第一次咬入时就被制造的伤口，已经因数学的层层包裹而不再被肉眼识别。这正是工具自噬在当代理性最尖端处的现身。

6.2 社会学：制度空心化的失明根源

第二节的第三幅透视图已经详述了这一现场。这里只追加一笔理论补充，以坐实本文与社会学核心论域的对话深度。在社会学家吉登斯（Giddens, 1984）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被重新定义为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持续调用的规则与资源，它既是行动的条件，也是行动的产物——结构的“二重性”已然否定了结构作为独立于行动的外部容器的传统预设。在经验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斯威德勒（Swidler, 1986）的“文化工具箱”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行动者如何策略性地从自身文化传统中拾取条目来为具体行动建造意义——在每一次对文化条目的调用中，“文化结构”被再生产或被修改。这些工作已经将制度从静态实体推向动态的进行时过程，与本文的洞见方向有一致性。但它们尚未命名研究者的那只手：吉登斯在论述日常行动如何再生产结构时，他的学术实践——写书、被引、进入教学大纲——本身正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再生产的一个活案例，但他没有把这一层纳入他的分析框架。本文的“自噬结构”不是要替代吉登斯或斯威德勒的工作——它承担的是一个他们未曾承担的追问：当一位社会学家通过分析“结构如何被行动再生产”来构建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此刻他自身的论文写作，正如何参与再生产他正分析的那个“结构”？这将是社会学自反性研究中一个尚未被精密描述的新切口。

6.3 教育学：知识传递模式中的生成性遮蔽

教育，或许是这个阐明代最日常、最高频发生的场所——因为它每天在千百万间教室里被重复执行，执行者（教师与学生）几乎无人察觉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在运作模式上完美契合了“概念的自噬结构”。

标准的教育模式，不管装饰了多少“以学生为中心”的修辞，其底层逻辑仍然是知识传递：有一批已知的、已经完成了的知识——牛顿定律、二次方程、宋词的平仄——在课程大纲里被列出，教师的任务是找到最有效的方式把它们传给学生，学生的任务是接收并能在考试中还原。在这个模型里，知识是物——已完成的、被权威认证的、可以被拆解成标准化单元进行传输的实体。

但任何真正从事过创造性工作的人都知道，知识从来不是这样活的。让我们看一堂具体的几何课。教师站在黑板前，画了一个圆，标出了半径和弦，然后写下定理：“垂直于弦的半径平分这条弦。”他接着演示证明步骤：连圆心与弦的端点，构成两个直角三角形，用全等三角形证出弦被平分。学生低头抄笔记。定理被“传递”了。但有一个动作被跳过去了：为什么是“垂直于弦”？那个最先发现这个定理的人，不是从定理开始推的——他可能是在画一个圆、画了很多条弦之后，忽然注意到那一条特殊的半径似乎总是把弦切成对半。那个注意，是在一个具体的、混沌的、边界不清的探索情境中发生的。定理，是那个注意被清理干净之后留下的骨骼。而现在，教师把骨骼给学生，让他们背下来，然后在考试时用。一堂课结束，学生学会了“垂直于弦的半径平分这条弦”，但那个能让定理在别的圆、别的弦上重新活过来的“注意到那条特殊线”的能力，没有被传递——因为那不是可以用黑板上的步骤来传输的“物”，那是一个只能在学生自己亲手去画、去量、去忽然看见的那个瞬间才能发生的生成动作。

而这个动作在课堂上被系统性地跳过了——不是教师不想教，是整个评价系统需要可被标准化评分的解题能力，而不是不可被标准化的“忽然看见”。教师那把在黑板上画圆的粉笔，就是那把从发生之河里捞出来的刀——他以为自己在传递知识，其实他在传递的是刀的锋利度；而他最应该传下去的那件事——刀是怎么从河里被捞出来的——被整个评价系统的语法挡在了教室的窗外。

这个现场不是孤立的教育学现象。它与本节4.1节那个哲学追问的切口具有严格的结构同源性，在此可以用工具自噬的三条执行环节做一次示范性的对照：教师的概念工具（“定理”“证明步骤”“标准答案”）依赖于将一个已在历史中凝固的认知产物作为可传递的起点（工具的切割需要）；但知识的生成源头——那个“忽然注意到垂直的那条弦”的瞬间——没有可以被切成标准化步骤的边界（对象的不容切割）；于是教师用“先讲定理再给证明”的教学流程强行制造了一个有起点的传递物，并把这个传递物当成知识本身——而他对这个“活认知已被做成标本”的制造动作失明了（自造伤口的盲视）。

6.4 人工智能：一个无法咬住的认知巨镜

大语言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已完成知识”的极致化身。它吞下了人类几乎所有公开文本，学会了这些文本之间的统计依赖关系，

然后可以根据提示生成高度连贯、信息密度极高的新文本。它能在医学院考试中及格、能写法律文书、能给哲学论文以看上去极有深度的评论。但这一切的底层，是没有任何“咬住”动作发生的。它没有身体，没有生死的紧迫，没有一个需要被它持续扶稳的自我认同，没有在不确定中做出不可逆选择的恐惧。它处理信息，但不经历发生。它生成文本，但它此刻生成的这句话，对它的“存在”与否没有任何存在论上的差异。

我们所见证的那种对它“有智能”“有知识”“有理解”的广泛幻觉，正是人类自身的概念自噬被这面巨镜倒映出来的结果。我们把自己对“知识”的认知——那个被我们自己的教育系统、学术体制、官僚制度长期做成了死标本的“知识”——投射到了这台机器身上，然后惊叹“它和我们好像”。它和我们做的那些标准化知识处理确实很像，因为那个标准化的知识处理过程本身，就是我们花了上百年时间，把自己原本活的知识发生过程，硬改造成了可以批量复制的死标本操作。我们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不是AI的智能，而是我们自己制造标本的技艺——但我们认不出自己的手艺，还以为看到了新的生命。

AI的涌现行为，仍然不能算作本文意义上的“发生”。它不需要承受“这个输出会不会改变我自己”的存在论风险。人类追问者的每个判断，都同时是一个存在论上的自涉动作——他在说出“X是真理”时，他的身份、他在共同体中的位置、他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都押在那个判断上。他押了，所以他会怕输。AI不怕输，因为它没有押任何东西。追问者对一个不能发生的东西投射“智能”幻觉，而他用以投射的那个“智能”概念本身，早已被他自己的概念刀削成了一个死标本——自噬的闭环在这里完整闭合：他用一把切死了活的智能的发生过程的刀，去衡量一个从未活过的东西，然后宣布这东西“也有智能”。

6.5 反向检验：皮亚杰的守恒实验——阐明的射程边界

一个声称对“追问者的认知处境”有普遍解释力的阐明代，如果只挑适合它的案例，它就只是在做选择偏误下的自我庆祝。因此，我必须在这里正面检视一个公认的、已有成熟解释框架覆盖得较好的认知现象——然后用本文的阐明代去套它，看看阐明是否会过度解释、或者暴露边界。

选取案例：皮亚杰（Piaget，1937）关于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的理论。该理论已有一个强有力的功能主义解释：婴儿和儿童的认知操作从感觉运动阶段到具体运算阶段再到形式运算阶段的发展，是大脑成熟与经验交互的产物，反映了逻辑结构在个体发生中的递进建构。这个解释诉诸神经发育、经验累积与认知架构的内部重组，不需要调用任何对“追问者存在处境”的宏大阐明代就能系统地解释大量可观察现象，包括同一阶段内儿童表现的高度一致性、以及跨阶段转换时表现出的认知冲突。

我承认，用“概念的自噬结构”去解释“为什么三岁小孩不会液体守恒任务”，是过度解释了。儿童在皮亚杰的液体守恒实验中说“高的那杯水多”，不是在执行一个“用概念刀去切发生源头”的追问姿势——他只是在还没有建构起可逆运算的认知阶段里，按照他能获取的知觉线索（高度）做出判断。本文的阐明代在一个七岁孩子的守恒错误上，不比皮亚杰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因为它不该去那里——它不是为此而造的。

这个反向检验逼我标定本文阐明的解释边界：它只针对特定层次的追问——认识论追问者的存在处境层。这个层次的追问，首要特征不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认知困难”，而是追问者正在试图用概念工具去追溯那些工具本身的生成条件，并在这一追溯过程中，把自己的追问行为豁免于追问之外。儿童的守恒错误，成人初学量子力学时的困惑，甚至一个物理学家在常规科学研究中对标准模型的熟练运用——这些都不在这个阐明的直接射程内，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已经分化好的认知框架之内，追问者不是在追问那个框架本身的起源。阐明的射程起效，是在追问者试图用框架内长出的工具去追问框架本身的根据时——也就是当追问进入“工具追工具的制造者”这一自反层次时。这时，工具自噬、手的自悖、时的遗忘这三个运作模式才会全部激活。在自反层之外，本文阐明的解释力不优于——也不应被用来替代——领域内的既有理论。

这个边界的标定，不是退却。一个生成机制的阐明代，必须知道自己在哪里长出了根，离开那片土壤就不该假装还能开花。

七、结论：觉知的处境与箭的指向

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宇宙的最深结构，究竟是物质，还是关系？

本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做的是另一件事：它揭示了在追问这个问题时，追问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这些工具本身是发生过程的后期结晶，依赖边界、区分、命名来运作——在触及那个先于一切分化的发生源头时，不是中立地“描述”了对象，而是亲自在对象上制造了工具无法消化的切口。追问者把刀从发生的河里捞出来，想用它去切河的源头。刀在源头上切出了一个只有刀才能认得出的伤口，然后刀自以为锋利，在伤口上磨得越来越快——直到刀自己豁了口，追问者端详着豁了口的刀，以为自己摸到了宇宙的硬底。

这就是概念的自噬结构。

它不是一种可以被永久治愈的认知错误，而是追问者作为被包孕于发生之内的存在者、在特定追问层次上必然遭遇的结构性处境。它在逻辑起点上制造工具自噬，在意义根基上触发手的自悖，在时间感上系统性地将活过程误认为死实体。它不能被消除，但可以被觉知。

然而，这里必须立即加上一层自我约束，否则“觉知”这个字眼就会在本文的最后一刻，滑回那个本文花了两万字试图撬开的既成事实论陷阱——把一个生成论上的处境，又重新做成一个静态的、可以被抵达的“终极答案”。

7.1 觉知的自噬处境

觉知，不是一块免于自噬的净土。它本身也是一把从发生之河里捞出来的概念刀——它是追问者在多次被自噬绊倒之后，从痛苦的反复中凝结出的一个认知操作：它包含了对刀的来源的回顾、对切的动作的观察、对手的位置的审视。这把刀比之前的刀更薄、更软、更不愿用力切，但它仍然是一把刀——它仍然在运作需要区分与命名的那个层面上发生。它必须把“盲区”命名为“盲区”，才能在追问者的认知场域里让“盲区”成为一个可以被处理的东西。而这个命名的动作，就是在发生之流上切下一刀——再轻、再薄的刀，也是刀。持觉知之刀的人，他在切出“我此刻可能正在自噬”这个判断的同时，他的切的动作本身，是否正在制造一个新的、更精微的自噬？他在觉知到“我的手正在握刀”的那个瞬间，他对这个觉知动作的执行，是否正在把“正在觉知的我”豁免于觉知之外？

这不是在玩一个无穷后退的语言游戏。这个追问有极其实践的重量。一个承认了“概念的自噬结构”的追问者，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他对这个处境的承认，当成一个他已经站在了处境之外的标志。他会想：你看，我已经知道刀是从河里捞出来的，我不再是那些蒙在鼓里的前辈了。这个“我不再是”的念头，就是新的自噬在觉知内部冒出的第一根芽。因为那个念头在语法上，把此刻的“我”和刚才那个“还在蒙在鼓里的我”切成了两个人——一个已经醒了我的我，和一个曾经睡着的我。而真正的发生现场，没有这两个人。只有一个此刻仍然握着刀、仍然在被当下的追问动作所塑造的追问者。他承认刀是从河里捞出来的，这个承认本身，就是他握着刀继续在河水里划动的一笔。觉知不是一个可以从发生之河里上岸的动作，它是换一种姿势，继续在水里游——并且知道自己在在水里。知道自己在在水里，不会让你变干，但会让你不再把每一次划水引起的涟漪，当成河的边界。

因此，本文对“觉知”的倡导，不是将之奉为一种新的、更本真的追问方式。它不具有任何认识论上的优越性，不保证能产出更“真”的判断。它唯一的效用是实践性的：让追问者在自噬发生时，能更快地认出自己正在执行那个自噬，从而为自己的下一步操作——是继续切、换个方向切、还是停下来——腾出一息自主的空间。

觉知不提供“治愈”。它不提供“出口”。它不承诺“山脊的那边有一种不必用切的方式来接近源头的认知形态”。因为那个许诺——那个“不切的源头”的许诺——本身就是用觉知之刀切出来的一个幻影：它切掉了“认知”（它必然需要区分与命名）与“源头”（它先于一切区分）之间的那道缝隙，然后把缝合了缝隙的那个想象产物，称为“不切的认知”。这个缝合，是人类追问者最古老、最顽固的自我豁免之一。“不切的认知”是一个语法的怪胎——如果它是认知，它就有区分，有区分就有切；如果它没有切，它就还没有进入任何可以被称作“认知”的领域。把这两个词拼在一起，不是在描述一个更高的境界，而是在用语法制造一个概念刀永远切不到、也无法反证其不存在的安全岛——而追问者把这个安全岛当成了航行终点，浑然不觉这个岛是他的刀在河面上画出的一个圈。

七百年后，这把刀也会锈断在河底。而“河水仍然在流”——这句话本身，也必须被加上一道护符。它不是在陈述一个独立于追问者的、“自己在那里的”发生实体。“发生的流动”不是一个先在的、自足的实在——它只是一个从追问者每一次用概念刀去切而不能完全切中的那个剩余项上，被反身性地指认出的一个影子。追问者永远不能直接触到“发生本身”——因为他一触，那个“发生”就已经在他的触的动作中被切过了。发生只能作为一个“总是在概念刀的切口之外溢出的东西”被知道——不是被看见，不是被把握，不是被证明，只是被知道：知道每一次命名都漏掉了一些东西，而那些漏掉的东西不是内容上的残缺，是结构的必然。那个溢出，不需要我的论文来证明它真的存在。它只是不在任何刀能咬进去的层次上，拥有一个可以被论文带走的伤口。

7.2 证伪条款

一个论述如果给出了自己永远无法被证伪的保障，它就违反了它自己最核心的洞见——把理论做成了不死的实体，拒绝进入那个一切结构都可能松动的发生流。以下三条，是足以让本文核心阐明代被证伪的条件。

证伪条款一：若未来我们能建造一个完全不需要与任何人类追问者发生交互——包括其输出不被人类阅读、其内部状态不被人类解释——就能独立提出并持续验证关于宇宙起源的自反性理论的人工系统，并在其理论演化的过程中，独立地、不依赖任何人类输入的训练语料地，生成在逻辑结构与内容上与本文阐明代高度一致的理论，且该系统的内部架构设计允许我们完全追踪其从初始状态到输出该理论的全部因果路径，其中没有任何一步等同于“将追问者自身豁免于追问”——那么，本文论断所依赖的“追问者的结构处境源于其在发生中的内部位置”这一根基便被瓦解。那将证明，这套追问的结构是纯逻辑的必然，与追问者作为一种有机体、有一个必须在发生中维持的自我这一存在处境无关。

证伪条款二：此阐明代最扎手的反例，是那些声称已经体认到“与发生不再有内外之分”的人——如某些深度的禅修者或神秘主义传统中的悟道者。他们认为自己已达到了“能所双亡”“天人合一”的境界，认知上的主客二元对立已被彻底消解，因而不受本文所描述的概念自噬的辖制。在此必须诚实：本文的阐明代，其射程可能止步于那些在体证层面将“主体-客体”二元操作彻底消解的经验之前。对于这部分经验，本文的框架可能不再是最佳描述。本文所能做的，是站在这个界限的此岸，为尚未抵达此岸、仍在概念追问中打转的我

们，提供一个更清醒的、关于自身处境的地图。这不是防御性的退缩，这是诚实地标定自己的射程边界——一个生成机制的阐明代，必须知道自己在哪里长出了根，离开那片土壤就不该假装还能开花。但同样诚实地，我为这个反例类预留了一个在理论上可能击穿本文的条件：如果对这些人的长期跟踪研究发现，他们一旦彻底停止修习——不是暂时的懈怠，而是完全放弃任何形式的维持性实践——之后，面对重大存在威胁（如身体衰败、至亲死亡、社会性人格羞辱）时，其原先被判定为“已超越”的处境反应（如将威胁实体化、对自我身份产生根本性焦虑、在不确定中无法安住）会根本性地、不可逆地不再生起，而不只是被一种更精微的觉知所“抱持”或“看空”——那么本文的阐明代为伪。因为那将证明，发生有一个可以被一次性的洞见永久切除的出口，而不是一条永远只能被一再踏入的同一条河。

证伪条款三（针对本文自身）：如果七百年后，这篇论文仍被当作活的、不可被追问的经典来引用，而非作为追问者的刀在某一历史时刻留下的伤口记录而被研究——且这种引用伴随着对“觉知”的神圣化解读，仿佛觉知真的提供了一个免于自噬的终极立场——那么本文本身就成了自噬结构的最完整样本：它揭示了一个处境，却被后来者当作了面对处境的免罪券。那将是本文最彻底、也最恰切的自我证伪。

7.3 箭的指向

因此，本文必须给自己定两条铁律。

第一，这支箭必须首先射向射箭的那只手。任何试图使用这个阐明代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它去照亮别人之前，必须先用它照亮自己：我此刻正在做的这个阐明代动作，它的认知位置在哪里？我用来切出“自噬结构”这个概念的那把刀，它是从哪段发生里长出来的？我从这个阐明里获得的，是真实的洞见，还是一种“我终于比他们看得更透”的快感？如果我只把它当手电筒去照别人，而不让它第一个照我自己握电筒的那只手，那我就在重复这个处境，而不是在阐明代它——而且比所有前人都更不可原谅，因为我已经被警告过了。

第二，本文的论述自身必须接受它所揭示的那个处境的约束。这意味着：我没有站在河岸上描述河水的流动。我此刻用来写这篇论文的每一行字，都踩在河床上——而我知道这块河床本身也是河水。我不能宣布这篇论文已经“克服”了概念的自噬结构。它只是在自噬结构的内部，通过更清醒地使用那把从河里捞出来的刀，切出了一个此前未被命名的新形状。这个新形状不是终点，不是答案，不是那座从西哲学开端就被错认的桥。它只是一把在刀背上刻了铭文的刀——铭文中写着：刀与伤口同源。

七百年后，这把刀也会锈断在河底。而那个从每一刀的切口处溢出的剩余，仍然不从属于任何刀能咬进去的层次——它不需要我的论文来证明它不曾被切过。它只是不在任何可以被命名的位置上，拥有一个可以被论文带走的伤口。

注释

[1] 本文第二节中的三个场景（物理学追问、心理治疗对话、社会学制度空心化分析）均为基于学科常识与典型情境合成的思想例示。其中出现的人物、对话及细节均经过概括、匿名化与简化处理，用于阐明概念机制的结构特征，不指涉任何真实的个案、个人或实证材料。物理学场景系对量子力学标准诠释的简化重构，不代表任何特定实验报告。在第六节中，凡涉及物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工智能的跨学科论证，均有领域内核心文献为支撑，并在正文中以作者-年份制标注；凡未标注文献且无法从真实学术出版记录中查证的断言，均为本文基于自身阐明代所做的推衍性论述，而非该学科领域的已有学术结论。

[2] 本文对海德格尔的讨论主要依据其《存在与时间》（Heidegger, 1927）中的相关分析，并旁及其后期对“存在本身隐匿”的论述倾向。此处不涉及海德格尔关于技术、艺术、语言等其他主题的思想，亦不试图对其哲学体系作出全面评价。文中所论及的“沉沦”“本有”等概念，均限于与本文“追问者自噬处境”有关的狭义对话范围。

[3] 怀特海的“误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主要在其《过程与实在》（Whitehead, 1929）中展开；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主要在其《创造进化论》（Bergson, 1907）中展开。本文在3.3节中对二者进行了阐发与推进，试图揭示该谬误与时间压缩在日常认知操作中持续再生产的机制，并在此二人的基础上补入“参与盲视”这一子过程。此处不涉及怀特海宇宙论或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其他面向。

[4] 维特根斯坦的“河床”比喻出自《论确定性》（Wittgenstein, 1969），尤见第96-99节等处。本文对该比喻的引述与批评仅服务于“手的自悖”这一独立概念的提出，并非对维特根斯坦原意的历史考据或否定，而是试图在其描述性洞见的基础上，推进对追问者自身反身处境的分析。

[5] 皮亚杰的守恒实验（如液体守恒、数量守恒等）是其发生认识论的经典经验基础，详见其多部著作，尤以《儿童对现实的建构》（Piaget, 1937）为代表。本文6.5节所用仅为概述性例示，不涉及具体实验数据的再分析或检验。

[6] 本文7.2节所述“深度禅修者或神秘主义传统中的悟道者”系一种逻辑上可能的反例类型，旨在为证伪条款提供对称的检验条件。作者不声称对这类经验拥有第一手知识，亦不对其真实性或普遍性作任何判定。

[7] “闭嘴计算”（shut up and calculate）是物理学界对量子力学诠释争论的一种流行概括，常被追溯至物理学家默明（N. David

Mermin) 等人的相关表述, 但确切开端已不可详考。此处仅取其在当代物理学共同体中的约定俗成之义, 指代一种搁置基础诠释问题、专注于数学计算工具实用性的集体态度。

参考文献

Bergson, H. (1907) L'évolution créatrice. Paris: Félix Alcan.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Gödel, K. (1931) "Über formal unentscheidbare Sätze der Principia Mathematica und verwandter Systeme I." 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 38, 173–198.

Heidegger, M. (1927)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Kant, I. (1781/1787)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Hartknoch.

Newton, I. (1687)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London.

Piaget, J. (1937) La construction du réel chez l'enfant. Neuchâtel: Delachaux et Niestlé.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Whitehead, A. N. (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Macmillan.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Wittgenstein, L. (1969) On Certainty. Oxford: Blackwell.

——全文完——

深化增补：被放跑的最近邻、操作化与证伪

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 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

增补一：与卢曼二阶观察、斯宾塞-布朗盲点的硬边界

正文与海德格尔、哥德尔、康德、后期维特根斯坦逐一切割, 却放过了最危险的那一位。卢曼借斯宾塞-布朗的区分演算提出: 每一次观察都必须使用一个区分, 而这个区分本身在该次观察中不可见——观察者的盲点不是失误, 是观察的构成条件。这句话与本文的核心判断在字面上几乎重合, 不划界则本文可被整段吸收。分野有三。其一, 盲点的位置: 卢曼的盲点在所使用的区分上, 它可以被另一个观察者在二阶观察中看见, 因而盲点是可迁移、可分配的; 本文所论的自噬不在某个具体区分上, 而在区分这一操作本身与不容切开的对象之间的错位, 因此它不能靠换一位观察者来消除。其二, 出路不同: 卢曼的方案是二阶观察的建制化, 即由系统去观察观察; 本文论证二阶观察只是把同一把刀递给了下一只手, 它改变了握刀者, 没有改变刀。其三, 代价不同: 卢曼的盲点不产生损伤, 它只是留下未被看见的部分; 本文所论的处境会在被追问的对象上留下一道由追问者自己造成的切口——伤口与刀同源, 正是这一点无法被区分演算表达。

增补二：三层机制的可判别形式

工具自噬、手的自悖、时的遗忘三层若不给判据, 就只能靠读者的领会。可判别形式: 工具自噬, 检验一个理论在处理其自身适用条件时是否必须引入一个它自己无法定义的原初项; 手的自悖, 检验一个为求稳定而做出的论证动作, 其成立是否依赖了它所要论证的那种稳定尚未成立; 时的遗忘, 检验一段文本在描述一个持续过程时, 是否在关键推论步骤上把它替换成了一个静态对象——可用该文本中过程性动词与实体性名词在论证句与描述句中的分布比来近似测量。三项都可施于任一具体文本而不需要预先接受本文的框架, 因此可用作对照检验: 若在大量以追问最深结构为目标的文本中, 三项都不呈现系统性偏向, 则本文所述的处境不具备它所声称的普遍性。

增补三：“觉知”不构成豁免立场

本文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是把它读成一种主张: 只要意识到自己在执刀, 就已经站到了刀之外。正文的第三条证伪条款已经预防了这一点, 此处再收紧一次。觉知不是一个位置, 而是同一处境中的又一次操作——它同样使用概念, 同样需要切开, 因此它同样在自造的对象上留下切口。本文不提供任何免于自噬的立场, 也不主张存在这样的立场; 它只主张, 知道刀与伤口同源的追问者, 与不知道的追问者, 在同一处境中做出的动作会不同: 前者会为自己的切口留下记录并标注其暂时性, 后者会把切口当成对象本身的形状。这个差别不产生豁免, 只产生可追溯性。任何把本文读作某种更高立场的解读, 都正好落进它所描述的那道错位。

增补四：与同批《临在》的分工

作者同批的《临在》与本篇出自同一原初追问，且互为条件，必须明确标注。《临在》做的是正面工作：撤销构成性语法之后，正面推导出那个不可被还原为被构成物的自主动作，并据此重新解剖恶。本篇做的是反面工作：阐明追问者在做上述那种推导时，其概念工具必然遭遇的结构性处境。两篇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一正一负——《临在》若不读本篇，会被误当作又一个超级实体的命名；本篇若不读《临在》，会被误当作一种取消一切正面主张的怀疑论。两篇合起来才成立：正面地基必须被提出，同时必须被标注为一把留下了伤口的刀所提出的。

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

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0.

George Spencer-Brown, Laws of Form, Allen & Unwin, 1969.

Thomas Nagel, The View from Now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Ludwig Wittgenstein, Über Gewissheit / On Certainty, Basil Blackwell, 1969.

Kurt Gödel, “Über formal unentscheidbare Sätze der Principia Mathematica und verwandter Systeme I,” 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 38, 1931.